

# 中国在墨西哥城心中（吗？）

——18世纪前后墨西哥城中心的“八连”华人市场\*

于施洋

**摘要：**近年来，“大帆船”贸易研究兴起，但在“全球化”的宏观理论上，还较少建立社会空间“网络”，没能深入考察“互动”。本文通过约1695年、1770年问世的两幅描绘墨西哥城中心的油画，结合历史档案和当代研究，视觉呈现与亚洲贸易紧密相关的“八连”市场，还原其背景、修建、命名过程，再对照文献确认其中的中国货物，证明这里创造了跨太平洋的物质丰富和心理刺激。最后，可以发现画中无一华人形象，虽与移民数量、主体认同有关，但更大程度上看，西属墨西哥种族画确实从未表现，“chino”一词也无固定所指，显示墨西哥文化秩序中从未正视华人的贡献，这是今后两国对话需要加强的方向。

**关键词：**新西班牙油画 “八连”市场 中国货物 华人面孔

最近几年，随着“大帆船”贸易（Galeón de Manila）研究的兴起，国内学界已经了解自16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中国货物从菲律宾的马尼拉运抵墨西哥的太平洋港口阿卡普尔科（Acapulco），之后“兵分两路”，一部分运往大西洋一侧的港口城市韦拉克鲁斯，再次装船跨大西洋进入西班牙；另一部分则通过骡队，经“中国大道”（el Camino de China）送到墨西哥城。<sup>①</sup>可惜的是，这些货物在当地的售卖和消费情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LSYZD2101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① 当然，还有许多秘鲁商人带着波托西的现银在阿卡普尔科的拍卖会上大量采购，但由于很快遭到抗议和禁令、成为走私性质，此处不多作涉及。

况，多一带而过、语焉不详，我们虽然大致知道新西班牙总督辖区<sup>①</sup>达官贵人和教会购置丝绸、蜂蜡、牙雕圣像，普通民众开始接受物美价廉的中国棉布，普埃布拉市（Puebla）的制陶业也逐渐受到景德镇瓷器纹样、颜色、技术的影响，但一直缺乏“落地”的过程性研究。

2022年下半年，“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组筹备“有帆自远方来”线上展，选取了一些历史地图、平面设计图、版画插图进行展示，发现艺术史对此大有裨益：新西班牙流传下数量惊人的种族画（casta painting）和城景画（cityscape），可以作为图像资料，让人直观历史情境，推断当时的制度、关系和观念。

经过查找，本文最终选定两幅表现墨西哥城中心大广场的布面油画，分别为比利亚潘多（Cristóbal de Villapando, c. 1649—1714）的《墨西哥城大广场即景》（Vista de la Plaza Mayor de Mexico）和无名氏的《八连》（El Parián）。<sup>②</sup>两者首先是流传有序、保存完整、复制效果较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陆续用作文稿配图、书籍封面、研究对象，传播影响大，讨论基础广泛；其次，迥异于殖民时期主流绘画的宗教题材，两幅均表现世俗的、盛大景观的城市（spectacular city），许多场景涉及日用商品交易，适合切入中国货物主题。

具体操作起来，其画幅较大、内容丰富，初看震撼而无从着手，但如循“大帆船”贸易的线索、将中国作为方法，可以找到不少周边文本（paratext）。两幅画分别出于约1695年和1770年的新西班牙画家之手，不仅内容有呼应，而且联合印证了至少三点：第一，墨西哥城中心曾经存在一个与马尼拉华人市场“八连”同名的市场；其次，该市场销售种类繁多的海外舶来品（productos ultramarinos），其中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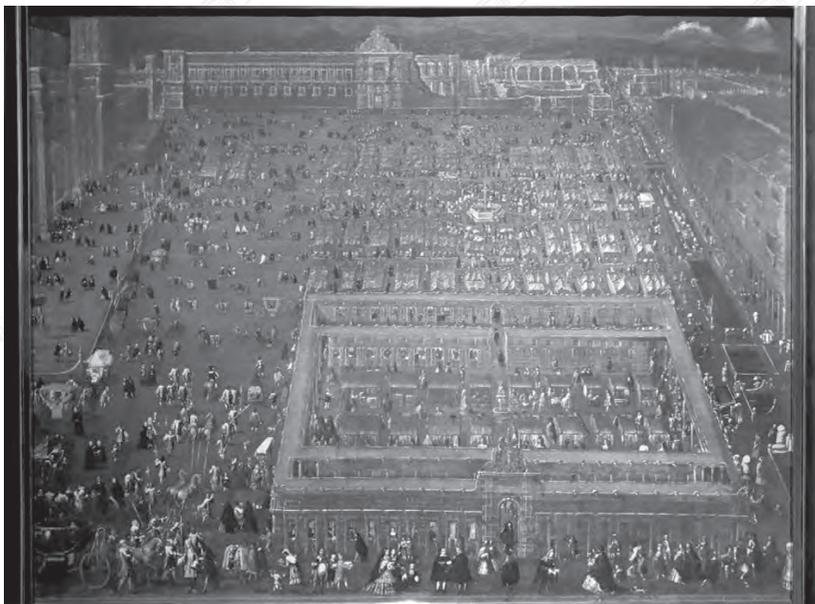
① “新西班牙”是西班牙帝国在美洲建立的第一个总督辖区（virreinato，字面义“副王统治的地方”），自1535年到1821年，陆续管辖北美洲到中美洲、包括菲律宾的大片地区。为免生僻和重复，本文中有时与“西属墨西哥”替换使用。

② 第一幅现藏于英国，此处采用其常见的西语名；第二幅现藏于墨西哥，博物馆给出的名称为“墨西哥城大广场”，但此处从艺术史家鉴定报告，见Gustavo Curiel, Juana Gutiérrez, Rogelio Ruiz Gomar, “El Parián”, *Anales del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stéticas*, número 078, 2001, pp. 215–220。

大量中国货物；第三，画中上千个人物没有任何华人面孔。这三个问题从空间聚焦到商品、再推及操作者，恰恰符合物质史研究自布罗代尔以来关注空间与历史、人与物的考察路径，于是分作三章，先展示该时期“中国”汇入新西班牙的情境，再讨论物质上的“拿来”，最后反思中国在西属墨西哥文化秩序中所处的位置。

## 一、墨西哥城中心的“八连”

古往今来，首都的中心往往是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用艺术作品来表现并不鲜见。但当我们端详这两幅作品，会很容易被一个封闭的区域所吸引，那就是大广场上的“八连”市场。



《墨西哥城大广场即景》，约1695年，布面油画<sup>①</sup>

现藏于英国英格兰威尔特郡科舍姆院艺术馆（Corsham Court Collection, Wiltshire）

① 电子版图片来源：Dr. Lauren Kilroy-Ewbank, “Cristóbal de Villalpando, View of the Plaza Mayor of Mexico City”, <https://smarthistory.org/villalpando-plaza-mayor-mexico-city/>.

### （一）引人瞩目的“八连”

在《墨西哥城大广场即景》中，正对画面的左侧指北，为美洲最早最大的主教座堂，但其恢宏的新西班牙巴洛克风格立面只在角落里露出很小一部分、且颇具特色的火山石颜色上加了黑，使其退居视野边缘位置，也就是说，画家刻意对这一殖民地宗教文化权威进行了弱化处理。同理，教堂对面的檐廊商铺、王家水渠东段大块模糊化，以点概括，意在将这一部分经济活动也隐去。正对画面的上方，广场东侧的总督府几乎居于灭点，面积既小，色彩且淡，南翼特别表现为损毁状态，上层拱廊暴露放大，造成吞噬阴森的效果，这同样是对殖民地政治权威的淡化。同时，远景中两座火山阴郁而雪顶覆盖，形成一种自然力蕴蓄、威胁的宿命感。

在这样的环境烘托下，近景中高光显示、并用几何构图强调的“八连”市场呼之欲出。可以看到，其位于广场西南，面积约过半，构成大广场上的主要商业区域；跟东侧摊位相比，其拥有固定建筑、内设单间铺面，格局分明、秩序井然；右侧王家水渠西段，勾勒尚属细致，用桥和小船通行、装卸增加了货物的数量感、速度感、便利感。

其实这幅画笔触并不十分精细，货物和人员没有辨识度，但它突出的特点是在“八连”的外墙顶部用非常鲜艳的红色标示了范围，吸引观众视线，暗示该市场的醒目：此处售卖东方舶来品，具有巨大的商业活力，是墨西哥城中心广场的中心，也是整个开放的大广场上唯一需要以入口“准入”的地方；其空间结构与别处不同，暗示着更远方的别处；进入其间，相比处于教会、总督权力之下，人的活动更加光明、欢愉、富于秩序、令人向往。

通读画面之后，结合史料能更好地理解这幅油画之于墨城“八连”市场“出生证明”般的意义。事实上，墨城这一位置的自由市场古已有之，但之前并没有成为“大手笔”艺术创作的对象，该油画是1688—1696年间任新西班牙最高长官的席尔瓦总督（Gaspar de la

Cerda Sandoval Silva y Mendoza, 1653—1697) 委托画家创作<sup>①</sup>、离任时带走、去世后流入欧洲市场的,而必须注意的是,“八连”市场1695年下半年才刚刚开工,1703年竣工,也就是说,1696年带回西班牙时,该画属于“合理虚构”,是周边已知环境与待建工程规划的结合。可以推测,当且仅当“大帆船”贸易的货物已在此处形成聚集效应,才便于画家想象、加工,也才被总督作为回国述职时避短扬长的材料,换句话说,重点突出这个刚开工建设的市场,实际讲述的是这一跨洋跨洲贸易已经存在、当时稳定、后续仍有很大前景,甚至可说是经历暴乱之后新西班牙总督统治的重点项目。

## (二) 18世纪初落成

那么,1695年画这个“八连”市场不算完全的无中生有,它有怎样的来龙去脉呢?应该说,起步较晚但发展稳定,所以受到冲击时得到的修复支持反而最大。

“八连”的定位和特色是舶来品,前身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的特许货柜,但周边的生鲜和二手市场远早于它。至少14世纪起,阿兹特克人修建特诺奇蒂特兰时,大广场区域就是重要的宗教中心,周边有许多宏大的金字塔,其间的大道和广场上就发展出居住、作坊、交易等功能区<sup>②</sup>，“集市”在征服者科尔特斯呈给卡洛斯一世国王的第二封和第五封信中被反复提及、大加赞叹<sup>③</sup>。到殖民时期,这类市场被称为“土人摊位”(puestos de indios),主要由原住民贩卖水果、蔬菜,为全城的日常生活提供生鲜物资,后来又区分出“便宜货摊”(El Baratillo),让底层居民低价买卖一些手工艺品、旧货(多为盗抢赃物)。17世纪初,市议会开始给舶来品单独发放执照,出租16平方米左右、可移动的“木

① Dr. Lauren Kilroy-Ewbank, “Cristóbal de Villalpando, View of the Plaza Mayor of Mexico City”, <https://smarthistory.org/villalpando-plaza-mayor-mexico-city/>.

② Jorge Olvera Ramos, *Los mercados de la Plaza Mayor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México: Centro de estudios mexicanos y centroamericanos, 2007, documento pdf generado en 2016), pp. 8-15.

③ Hernán Cortés, *Letters from Mexico*,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Anthony Pagden, (Yale Nota Bene book, 2001).

质货柜”（cajones de madera），最终形成三个相邻的市场。<sup>①</sup>

值得联系的是，西班牙殖民者从1519年登陆、1535年建立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一直对此地进行垄断性的商品输出，但这种进口货物在什么地方交易？似乎没有特定空间，或者就在此地而不太被强调，以“17世纪初”为起点，则让人关联与亚洲之间的“马尼拉大帆船”，自1565年乌尔达内塔发现菲律宾到墨西哥的回航，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调整，从亚洲运来的货物无论种类、数量、质量均大幅增长，其集中交易的场所因而也变得特殊，这印证了著名“大帆船”研究者卡门·于斯特在1977年学士论文中就提出的观点，新西班牙试图开发一条独立于宗主国的商路，并且最终成为了安达卢西亚垄断的最大竞争者。<sup>②</sup>

而进一步明确修建“八连”，直接原因是破坏的力量。1691年，严重旱灾和玉米歉收引发原住民暴动，1692年6月8日，愤怒的饥民冲击市中心，不仅打砸抢，而且烧毁了全部木质货柜，以及市政厅全楼、总督府一部分<sup>③</sup>，也就是前述油画背景中的情况。两周后，市议会向席尔瓦总督上书，商讨在原址上重建市场；1695年8月18日，国王谕令送达，批准重修且指示为石质建筑，以便保障美观、安全、商品交易和税收稳定。当年起，多方筹资的市场开工，到1703年9月3日，一片坚固的建筑群在大广场西南角落成。<sup>④</sup>根据墨西哥城历史档案馆的平面图，这里是一个单体固定设施，南北分别对着市议会和大教堂、各有三个入口，东西对总督府和檐廊商业街、各留一个入口；外圈南北110米、东西88米，两层楼结构，上层作为仓库，下层仍为商铺，内圈另起四道75米×53.5米的平房设店面。<sup>⑤</sup>可以看到，重“修”的只有

① Op. Cit. Jorge Olvera Ramos, pp. 17-48.

② Carmen Yuste, *El Comercio de Nueva España con Filipinas, 1590-1785*, tesis para optar al título de licenciado, Colegio de Historia,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UNAM, 1977, p. 5.

③ Rebeca Yoma Medina, Luis Alberto Martos López, “El Parián: un siglo y medio de historia y comercio”, *Boletín de Monumentos Históricos*, no. 10, 1990, INAH, México, p.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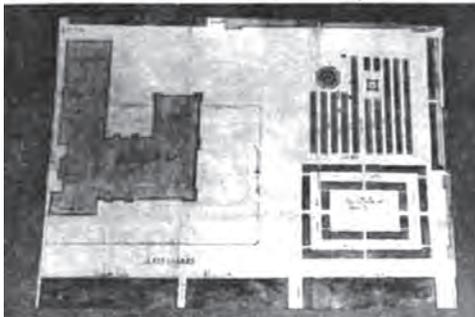
④ Op. Cit. Jorge Olvera Ramos, pp. 50-52.

⑤ Op. Cit. Rebeca Yoma Medina, Luis Alberto Martos López, p. 27.

舶来品市场，中心是保留下来的二手市场，而菜市场排除在整个建筑的外围（东边），均仍为流动摊点。

accesorias que daban a los cuatro vientos, de forma regular y corrida, coronadas por ven-  
\* AHCM. Mercado, 3728, exp. 3-11 vta. y 12.

Figura 2. Plano de la  
plazuela de El Perdón  
en el siglo XVIII. Al  
oriente se notan las  
casas de la Plaza  
Mayor.



墨西哥城“八连”市场平面图（左为北，“八连”为右下两圈矩形）

为什么只有舶来品市场从货柜升级成了店铺，还统一享受清洁、上下水、照明服务？<sup>①</sup>很显然，这是等级社会的一种等级化的商业<sup>②</sup>，议会提案已经做了核算：如不修缮“木质货柜”，至少损失15000比索的岁入<sup>③</sup>，这部分职业商人每年一月份即签约、预付200比索的租金<sup>④</sup>，而生鲜市场和二手市场自1694年至1745年全部交由弗朗西斯科·卡梅罗斯（Francisco Cameros），每年仅500比索包干<sup>⑤</sup>。对比可见，自由市场收益低、人员流动性大，上一次暴动还让人心有余悸，卫生、风化、水火之灾的痼疾也无从改善，反过来，进口商品利润空间高，店铺登记造册之后也便于管理，各方面优势显而易见，适宜升级改造。由此，修复工作进一步证明，东方舶来品市场能够带来稳定的财富和秩序，

① Op. Cit. Jorge Olvera Ramos, p. 55.

②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ción material, economía y capitalismo. Vol. II: «Los instrumentos del intercambio»* (Alianza, Madrid, 1984).

③ Op. Cit. Jorge Olvera Ramos, p. 51.

④ Ibid., p. 14.

⑤ Ibid., pp. 61-69.

是18世纪初墨西哥城经济和社会的支柱之一。

### （三）命名为“八连”

一个建设结构坚固、设施完善的市场，命名也是重要的环节。“八连”这个绝无仅有的名字，显示出其与马尼拉华人明确的关联。

“八连”是音译，但本身并不是一个西语词，而是用西语拼写的菲律宾他加禄语，甚至可能出于古马来语“行走”“方便”，或者巴基斯坦人所谓“暂时休息的地方”。有趣的是，这个词现在被收入了西班牙王家语言学院词典，意“市场”或“公共场所”，但基本只有墨西哥使用过，恰恰证明了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由于“大帆船”贸易而产生的联结。

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在马尼拉“建城”，此前在船上或岸边“摆摊”的华人不再随季风往返，开始到马尼拉城里固定开店，很快人数超过西班牙人几倍、积累了大量财富；为此，殖民统治者心生戒备，1582年在内城围起栅栏，建起4间大铺舍让华人集中居住，随当地人指“市场”的叫法，记录下“八连”的名字。从福建漳泉地区来到这里的中国商人、工匠虽然要缴纳高额的人头税，也没有什么政治权利，甚至遭遇过多次屠杀和驱逐<sup>①</sup>，但总是忍辱负重，不断壮大。

那么，为什么要在遥远的墨西哥城起用这个名字呢？鉴于其词形比较特殊，在两地出现的时间也有前后相继关系，笔者认为不是多地生发、偶然重合，而是明确受到影响、有意为之。那么影响是如何传导的？有文字提到“华商行会（gremio de los chinos）向总督申请”<sup>②</sup>，目前笔者没有找到档案直接证明，也没有看到这个行会的相关资料，但希望通过一些材料间接展示这个名称的文化形象，最直接的就是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母羨1589年7月13日、马尼拉大主教萨拉萨尔1590年6月24日分别发出的两封信，前者写道：

① 施雪琴：《菲律宾华人移民政策与人口的变化：从十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洋问题研究》1996年第3期，第47页。

② Ángeles González Gamio, “El Parián”, <https://eloficiodehistoriar.com.mx/2008/10/28/¿que-es-un-parian/>.

他们在马尼拉城这，靠着河边，有个叫作八连的市场……进出的（中国）人不计其数……这个市场上有丝绸、粗棉布，想要什么都有。手艺行当也是应有尽有，银匠、裁缝、鞋匠、木匠、蜡工，等等；吃饭的酒馆，西班牙人买肉的肉案，还有中医和他们的药店——不是混好的成药，只按味单卖，因为他们相信草药。总之是应有尽有。<sup>①</sup>

短短几行的描述中，最高频出现的就是动词“有”（ay，7次，中文为免重复去掉了几处），其次是连词“无论想要多少”（*quantas cosas quieren/ quantos oficios quisieren*，2次），并且采用列举的手法，衣食住行全部点到：丝绸、结实耐用的棉布以及裁缝，维生、养生的肉类、酒馆、药物，日常和教会所需的木制品、银制品、蜡烛，以及鞋匠和上文描写的小船、舢板，该市场的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不久之后，马尼拉首任主教萨拉萨尔给国王菲利普二世写了专门针对八连市场和华人的呈文，提到：

百业皆备，居住市内的华侨，皆有业栖身，无一游手偷闲之人。他们所造物品，间有胜过西班牙运来者；塑像亦佳，全岛各地之教堂所供奉的神像，皆出诸华人之手……市中有饭店多家，华人、土人皆集食于此，即西班牙人亦常来买醉。<sup>②</sup>

虽然这两份材料属于体制内的文书，传播不会特别广泛，但马尼拉华人市场“八连”如果已经到精英分子大书特书、战略汇报的规模，名气应该早已随货物和人员流传。当这个市场发展迅速（1571年仅150人的社群，到1589年已经是“五千往上、常常达到一万”）、一应

① José Antonio Cervera, *Cartas del Parián, Los chinos de Manila a finales del siglo XVI a través de los ojos de Juan Cobo y Domingo de Salazar* (México: Palabra de Clío, 2015), pp. 88-89.

② Ibid., pp. 102-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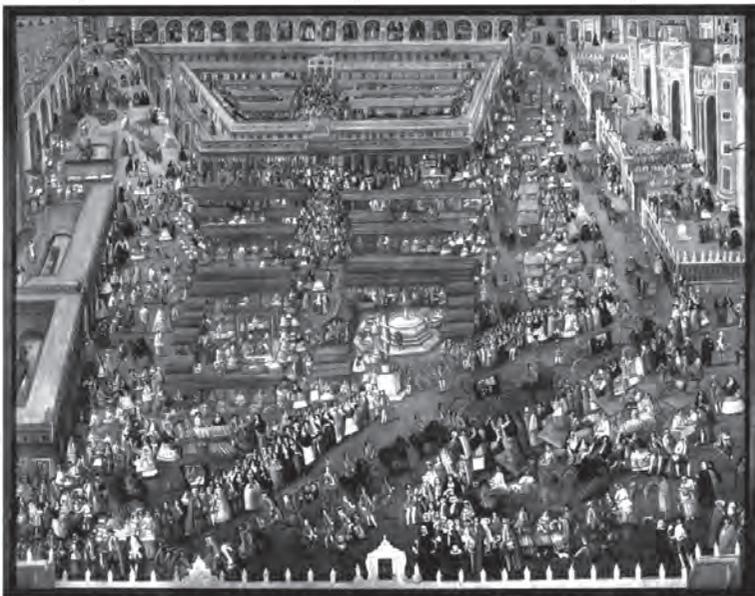
俱全（1645年店铺多达1200间，木匠、铁匠、工人、医生、药剂师、商人应有尽有）、影响重大（不仅保障殖民者的日常生活，而且每年3万—4万比索的税额，直接维持着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它就从一个专有名词成了一类事物的代指，跟亚洲贸易有关的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均有市场效仿该名，去除“隔离”“防范”的意涵，试图再现华洋杂处、海外领地辽阔的繁荣景象，似乎宣示：墨西哥不能全数生产西班牙提供那些产品，又受限制不能与美洲其他地区或欧洲国家贸易，但至少有一个壮观丰盛的市场，提供新奇优质的舶来品，带来置身“东方”的异域感，以及“大帆船”贸易为我所用的成就感。

## 二、“八连”市场中的东方舶来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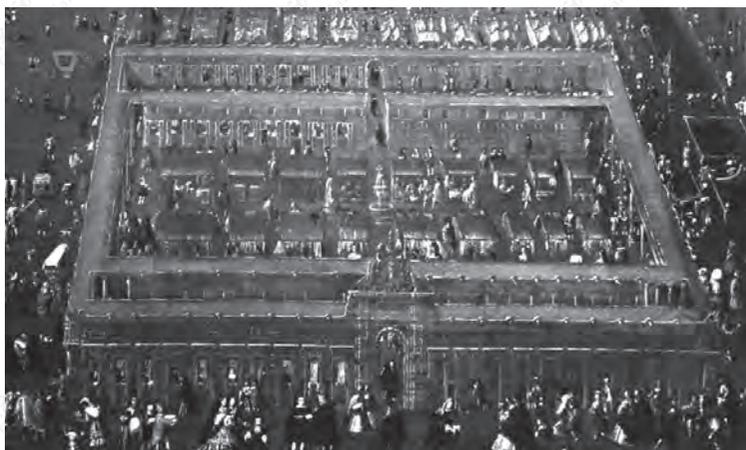
约画于1770年的以下作品意在表现新西班牙总督德克洛瓦（Carlos Francisco de Croix，任期1766—1771年）前往主教座堂做礼拜的场景，即从正对画面的左下位置，鸣锣开道前往右方的教堂<sup>①</sup>，这个主题原本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在克洛瓦时期，驱逐耶稣会引发了许多社会抗议和思想动荡，但画家显然没有拘泥于总督与宗教权威的会面，而是在巨大的幅面上详尽描绘了大广场的商业和日常生活，甚至被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美学研究院团队1999年鉴定的时候直接命名为“八连”。

直观上，这幅画与前一幅的方向恰好南北对调，是从东侧的总督府高处俯瞰和远望，展示了此前没有见到的西侧檐廊街；其次，“八连”市场虽然被安排在了远景，但画家似乎没有掌握透视法，把矩形（如果相信矩形的规划得到了落实）近大远小的短缩关系画反了，反而能吸引视线停留。最重要的是，跟上一幅虚构、概念性的处理相比，这一幅的局部极其写实、具象、鲜艳，让人可以真切地看到其内部交易的场景。

<sup>①</sup> Guadalupe Lozada León, “Vendimia en la Plaza Mayor”, <https://relatosehistorias.mx/nuestras-historias/vendimia-en-la-plaza-mayor>.



《八连》，无名氏，2.66m×2.12m，约1770年，布面油画  
现藏于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历史学研究院下属墨西哥国立历史博物馆  
( Museo Nacional de Historia-Castillo de Chapultepec )



《墨西哥城大广场即景》细节



《八连》细部

如果延续前一节对“八连”的空间规划，可以发现一个细微的变化：其中心应该保留二手市场，但本图所见显然不是，确切地说，兜售旧货者大多位于“八连”之外，呈站姿，从肩膀到双手搭挂一些商品；“八连”内部则成了高级店面的延续，略简化为带顶棚的摊位，摊主在其后或站或坐，最重要的是，商品种类、数量不再是旧货交易的“随机”性质，而是大量重复的码放堆积，说明来源稳定、专营专销。也就是说，从1703年正式落成，到本画创作的大约1770年，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八连”市场态势良好，其货品种类和价格冲击了二手市场，不仅营业空间扩张挤占，而且能带动当地小手工业、制造业。

再就“八连”市场店铺一排排细看，确实称得上琳琅满目，其中许多可能跟亚洲贸易有关：市场内部内圈朝东的店面门口陈设着几种大件家具：八扇屏、三层的抽屉架格，似乎与大椭圆镜组合在一起的衣箱，以及半人高形似字画缸、帽筒的物品。其次，主入口两侧墙上挂有许多整齐排列的小物件，圆形带手柄，以及白色、彩色的颗状块状物，推测为手持的镜子和贝壳、珍珠类吊坠、胸针、耳环饰品。另外突出的是既有衬衫、裤子、披肩一类的成衣，也有铺开展示和成匹堆叠的布料，条纹、格子、缠枝等纹样和颜色各不相同。所有这些图像表明，画家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和实地的考察，有意且能够让观众见证东方货物之汇聚。

如何验证“八连”市场这些东方舶来品呢？此前国内多数研究以

定性为主，笔者新近找到一份有趣的材料，来自2007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一篇学士论文，其从墨西哥国家档案总馆（Archivo General de la Nación）搜集了1589—1699年墨西哥城商务领馆（Consulado de Comerciantes）11份商人宅邸的财产清单，整理出其家中共置办使用7类舶来品，包括：服装，布料，床品，手绢，家具，珠宝/摆件/武器，瓷器，除最后一类直接标为亚洲，前6类分别标亚洲、欧洲、美洲他地或本地，加上数量和价格<sup>①</sup>，对于还原历史场景十分有效。

对照前述油画，几乎所有类别均得到了证明。首先“家具”类，来自亚洲的最早1628年出现，共7家有购，少则2条记录，多则13、15、16条，其中大小箱匣（且往往强调原装五金件）的购买最为普遍，每家都有两件至若干件。此后陆续增加椅子、坐凳、写字台、床、食橱等，屏风在50年代出现，一架是画中那样八扇的、另一架是2组四扇的，90年代3个家庭也各自使用1—3架不等，十二扇、十扇、八扇屏价格都在100—120比索。此外值得关注的是，1695年，雷特斯（Teresa Retes）家购买带组合件的大漆质写字台花费高达450比索，另一个博古架也达425比索，是这批清单中的顶价。作为对比，来自欧洲、美洲其他地方或本地的记录少很多，各家均只有1—3项，且较少随录价格。由此，油画中的几件大家具虽然数量不算多，却着实有代表性，其规格大、运费不菲但可以要价很高，所以对墨西哥保持供应；屏风暗示出宽敞而略需分隔的家庭空间，衣箱代表丰富的衣物和旅行、移居的生活方式，其余物品及价格也都无一不透露着使用者优渥的经济条件。

同理，继续观看“珠宝/摆件/武器”类，来源亚洲的有1628年、1645年、1695年、1699年的四份清单，记有项链、手镯、念珠、耶稣

<sup>①</sup> Teresa Berenice Ballesteros Flores, *Entre el ser y el parecer. Los objetos suntuarios orientales en el ajuar domésticos de mercaderes del Consulado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1573-1700)*, tesis para optar por el título de Licenciada, Colegio de Historia,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UNAM, 2007, pp. 105-138.

受难像、一对小狮子、雪茄盒等，材质涉及金、银、水晶、珊瑚、石榴石、椰子树或壳。由此，油画中“八连”市场售卖的镜子、饰品，也基本得到说明。同样，对比其他来源，只有两份清单有欧洲的望远镜、钢质圣器盒、威尼斯镜子和玻璃念珠，还有1个本地的刀剑饰物。

陶瓷类反而只有3份清单提及，其中1644年涅托家（Francisco Nieto）仅5个盘子、7个碗，值1比索；1645年奥索里奥家（Lope de Osorio）记录16条，除成套餐具外，罐确有数个，“体积相当大”“近半米高”“超过半米多”“带银质封口”“带盖”；此外有许多造型各异的摆件，如小狮子、小马、草鹭、“像独角兽一样的动物”，均为“中国瓷”，另外还有2个“瓷花盆”，这些都是以往外销瓷研究中忽略的样式。1695年雷特斯家明显更成规模，许多带把茶杯都是按一对、十个、一打来传承的，其余碗、罐、小狮子若干，还有某“中国陶瓷小件”，各20、30件，分值14、16比索。此外开始出现专门的、10大15小、30个常规大小的巧克力杯（chocolatera），前一组10比索，后一组8比索，是非常典型的根据本地需求和创意向景德镇订制的产品，是跨太平洋贸易催生的新事物。<sup>①</sup>

最后，看纺织品，在该文章中细分成了四种：一为服装，10家有亚洲货，最早从1589年就有记录，其中多件提到马尼拉华人“商旅”（sangle）样式，另外比较昂贵的是1695年“一条蓝缎裙，金银线绣花，350比索”，还有4条到脚（tapapiés）、带绣工的长裙都在50—90比索。二为床品，9家用亚洲货，3家用欧洲货，无美洲他地产，1家有墨西哥本土制作。三为手绢/餐巾/祭坛桌布类，6家用亚洲货，4家也用欧洲货，2家还采用了本地加工。四为布料，同样10家有亚洲货，早自1589年即持续以各种数量单位收入：磅（libras）、盎司（onzas）、巴拉尺（varas）、匹（piezas）、段（pedazos）、箱（cajones）、捆（fardos）、卷（envoltorios），可见材质和工艺极其丰富。根据该论文制作的表格，

<sup>①</sup> 于施洋、罗亦宗：《辛塔·克拉埃：〈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国瓷〉》，《海交史研究》2020年2期。

布料至少有30种，数量在1到9不等，多的如锦缎、丝绸、塔夫绸、天鹅绒，连金线都占据了极大的份额。<sup>①</sup>纺织品问题比较复杂，此处暂不展开，但正如阿根廷学者博尼阿连近年坚持的意见，传统认为与亚洲贸易的只有制成品、奢侈品，用于精英消费，但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其也满足大众消费，以半成品形式影响到新西班牙甚至西班牙的生产结构。<sup>②</sup>

总体而言，虽然这11份清单主要针对17世纪墨西哥城富商家庭名下的财产情况，也就是说，比《八连》描绘的时代提前了百余年，而且仅代表权力中心的精英阶层、无法顾及中下层和外省，但这些家庭自身就参与“大帆船”贸易投资和批发零售，比起经济史上常用的船货清单、海关登记，其婚丧嫁娶的财务盘点代表了购买和日用场景，更在实用性上叠加象征性，因此更能加深对市场终端的感知。可以明确，第一，舶来品买卖在17世纪就已经很兴盛，18世纪初兴建专门市场之后，一定时期内（该论文提到从17世纪后半叶到1785年<sup>③</sup>，也就是走马尼拉—印度洋—塞维利亚航线的菲律宾王家公司成立前）应保持了稳定发展；第二，跨太平洋向东流动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家具、饰物、瓷器几类，其中纺织品量大、价高，瓷器次之，其他几类各有特色；第三，论文和油画基本没有涉及香料问题，实际上，西班牙在菲律宾并没有收获和收购太多香料，也没有刻意进行物种交换，加上墨西哥本土丰富的食材和味觉系统，完全可以开辟香料之外的新的研究对象，如图中大量呈现的红薯、火鸡；第四，在讨论亚洲舶来品的时候，不能盲目乐观、自以为是，必须与本土制造、欧洲进口形成参照，也就是说，中国货物并不是空降、绝对地输入，而是与使用和欣

① Op. Cit. Teresa Berenice Ballesteros Flores, pp. 78-80.

② Mariano Bonialian, “La Seda China en Nueva España a Principios del Siglo XVII. Una Mirada Imperial en el Memorial de Horacio Levanto”, *Revista de Historia Económica, Journal of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 35, Issue 1 (March 2017), pp. 157-171.

③ Op. Cit. Teresa Berenice Ballesteros Flores, p. 99.

赏体系相结合，作为原料在当地融入加工生产，这模糊地呼应着“八连”摊位上黑色的布鞋，虽然目前未见专论。

### 三、“八连”市场不见华人

通过端详两幅油画，我们了解到墨西哥城中心“八连”市场的建造、命名、所卖商品种类和形式，证明至少在1695到1770年前后，墨城最核心最传统的商业空间里，与亚洲尤其中国的贸易占据了一席之地，其固定建筑、整洁环境、货物质量和数量十分优越；由此推想：作为大西洋、太平洋商路汇聚的核心，美洲、欧洲、亚洲商品汇聚的枢纽，墨西哥城大广场应该是18世纪前后社会群体和风俗最全面交融的空间，如果《八连》动用了2.66米×2.12米的画幅，勾画了上千个人物，群像里有中国面孔吗？

答案是没有，一张中国面孔也没有。因为技术问题？毕竟脸部面积太小，但容貌之外，画家主要是通过服饰装束来表现人物的，总督、士兵、教士、修女、农妇等无不清晰可见，许多姿势还非常生动逼真，所以，这不是画家“手”的问题，是“脑”的问题，是中国人“可画性”甚或中国人在新西班牙社会的“可见性”问题。

笔者认为，虽然墨西哥城市中心大广场上建起一个宏大的市场，既以马尼拉的华人市场为名，又充满新奇实用的“中国船”<sup>①</sup>舶来品，但并没有随之建立起一个明确、体面的“华人”形象，为证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弄清华人移民的数量，其次参考移民研究中“主体认同”和“客体认同”的理论，一方面考察移民是否愿意认同、彰显自己的华人身份，另一方面讨论华人群体以外的社会是否将其看作“华人”——放到“八连”市场时期，这两种认同都显得模糊不清。

<sup>①</sup> “中国船”，西语写作Nao de China，基本与“马尼拉大帆船”（Galeón de Manila）混用，在墨西哥更常见。

### （一）殖民时期赴墨华人

本文涉及的赴墨华人，主要框定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这两百年间。这时期之前，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被甸、董经胜总结，无论“殷人东渡”还是“扶桑国”的传说，都是尚未得到历史认可的猜想；而这时期之后，尤其19世纪中后期的劳工、排华以及20世纪初的屠杀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已经得到不少研究。唯独殖民地时期，中国人随着“大帆船”贸易首先来到墨西哥，虽然有“比较普遍引用的一条资料”，但终究“历史资料不足，关于殖民地时期中国人在墨西哥的情况，直到现在我们知之甚少”。<sup>①</sup>

这条普遍引用的资料，指的是1635年6月22日，墨西哥城市议会处理的一份请愿书，同意将大广场上“过多”和“造成不便”的中国剃头匠限制在12家、安置到郊区、要求招收西班牙学徒。<sup>②</sup>有美国学者在1942年的短文结束时强调“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sup>③</sup>，但直到2000年之后，随着全球史、海洋史的兴起，多位墨西哥本土学者和西班牙、美国学者加入，查阅纸质档案资料，才整理出此时期亚洲移民、华人移民的信息，其中卡里略·马丁2015年博士论文综述了总数量问题：

Floro Mercene认为仅菲律宾人就有6万之众，Jonathan Israel则框定1650年之前向新西班牙运送了48000名亚洲奴隶，每十年6000人的速度；Edward Slack提出1565年到1815年间作为自由民和奴隶的亚洲移民总数在4万到10万，Déborah Oropeza较为保守，取1565年到1700年，推算有7200名中国人抵达阿卡普

① 林被甸、董经胜：《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和居墨华人的命运》，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学术委员会编：《北京论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对人类文明方式的思考——北京论坛（2006）论文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6页。

② *Libro treinta de las Actas Antiguas de Cabildo* (México: A. Carranza y Comp. Impresores, 1908), p. 24.

③ Homer H. Dubs and Robert S. Smith, "Chinese in Mexico City in 1635",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Aug., 1942), Vol. 1, No. 4, pp. 387-389.

尔科港口，其中只有4500—5000人留在新西班牙；Tatiana Seijas的意见为每艘大帆船平均引入60名奴隶，1565年到1700年间总计8100人。<sup>①</sup>

根据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测算，马丁最终认为1565—1815年间有1万—2万亚洲自由民和奴隶跨太平洋东行抵达阿卡普尔科，平均下来每年40—80人；即使以斯拉克（Edward Slack）的10万计，也不过每年400人，或者以色列（Jonathan Israel）之说最高，每年600人。由于远离一手资料，笔者无法区分这些移民来自从印度、孟加拉、菲律宾、爪哇到中国、日本的哪部分亚洲，无法区分其为奴隶还是自由民，因此无意加入对具体数字的追究，仅仅提出一些参照来解读这些数字：1570—1650年间，被贩卖到新西班牙的非洲黑奴在11万—15万人；约1612年时，墨西哥城人口组成为1.5万西班牙人、8万印第安人、5万黑人和黑白混血人；1790年，新西班牙总督辖区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总人口已经增长到177万余人，墨西哥城人口114万余人。<sup>②</sup>也就是说，亚洲移民从开始就不足非洲黑奴十一，在墨城、西属墨西哥所占比例较低，如果墨城人口在180年间增长了约8倍，那么比例还在越变越低。这样一个群体的历史存在值得肯定，但面对居统治地位的西班牙人、土生白人，面对数量占优的印第安人、非洲人，无论如何都属于“他者”且力量薄弱。

## （二）缺乏“主体认同”

无论以千还是万位数计，“大帆船”贸易期间抵达西属墨西哥的华人是如何保持文化传统的？目前来看，直接记录很少，基本可推断为没有建立起华人主体认同，但这并不是个无效的问题，而是可以窥见

① Rubén Carrillo Martín, “Los chinos de Nueva España: migración asiática en el México Colonial”, *Millars. Espai I Història*, 21(39), 2015, pp. 21–22.

② Dirección General de Estadística, *1<sup>er</sup> Censo de Población de la Nueva España. 1790* (México: 1977), p. 22.

移出社会和移入社会的引力悬殊。

一般而言，华人的主体认同与中国国力正相关，国力越强，主体认同越强，此外还需考虑时间差和距离比。<sup>①</sup>前往墨西哥的华人，主要是在马尼拉从事服务行业的华人，多为福建漳泉籍，离乡背井的时机，宏观上有16世纪末万历皇帝不理朝政、17世纪初期到中期明末的动荡和满族入主，微观上更多源于“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资源限制，对于“国”和“国民”的概念、西班牙语词chino与明清两朝的对应，恐怕并不清晰和坚定。到墨西哥之后，按两艘大帆船上半年西行、下半年东行的速度，托寄物品是一件周期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事，加上必须采取书信的形式（目前未见任何历史留存），对汉字读写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保持通讯堪称艰巨，因而也很容易中断、最终失去跟故乡的联络。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保留一定的习俗，多数也消融在个体性和日常性中，不成其为文化的表征。

另一方面，更多案例显示早期移民做出许多努力，试图在新西班牙社会站稳脚跟。早在1597年，就有墨西哥州的胡安·阿隆索申诉，称自己不是印第安人（yndio）而是华人（chino），无地可种也没有交租的义务，有权购置20头骡子，以便在苏尔特佩克银矿区从事运输。<sup>②</sup>同年，他还申请骑马和佩剑许可，同样得到批准的裁决。<sup>③</sup>1608年，“生于菲律宾、在本城（墨西哥城）结婚的穷困华人”马科斯·加西亚申请保护，称其在船讯到来时前往阿卡普尔科做买卖，但受到港口上的人阻挠欺凌。<sup>④</sup>举这两人的例子，一方面因为文本内部体现了早期华人在经济上的奋斗、向骑士阶层的靠拢，另一方面从文本的产生看，两者活动时间都很靠前，但都迅速掌握了异国语言（至少是代笔）和

---

① 李安山：《国际移民框架下的华侨华人——身份认同与双重国籍之辨析》，《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

② AGN, Real Audiencia, Indios, cont. 4, vol. 6, exp. 1200 (1597).

③ AGN, Real Audiencia, Indios, cont. 4, vol. 6, exp. 1202 (1597).

④ AGN, Indiferente Virreinal, caja 3724, exp. 22, (1608).

法律体系，努力维护自身权益，可以说，他们的目光更多投向未来在当地，而不是过去在故乡。

在谋生的基础上，华人还通过婚姻加紧融入。根据目前的材料，1673年之前，登记结婚的华人80%为奴隶，多数迎娶印第安女性、黑人，其次为黑白混血、印欧混血，极个别与西班牙或土生白人结婚。<sup>①</sup>1673年，西班牙王室颁布法令、规定亚洲人不得再被作为奴隶贩卖、一概视为王冠领上的自由人，此后华人与印第安人的婚姻迅速降到只有6桩登记在册<sup>②</sup>，选择印欧混血女性的情况明显上升。虽然这需要考虑代际变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个人群最初处于相近的法律和社会经济地位，但在有机会上升时，华人会比较“权衡利弊”，这种注重立足、延续的情况下，恐怕很难主动彰显自己的来源地身份，正如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所指出，华人移民海外、与各种不同国家的文化互动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其中早期华人移民与当地多数民族通婚并且融合，为了上升、一旦上升到国家精英阶层，往往放弃华人的身份。<sup>③</sup>

### （三）缺乏“客体认同”

殖民地时期，新西班牙总督辖区是向欧洲传播中国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的一个中转站，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就是在这里查阅资料最终写成，但是，“天朝上国”（China）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如同天方夜谭，跟生活中见到的华人也存在落差，似乎从未成为文学史中的意象或设定<sup>④</sup>，由此将笔者引向绘画中的形象问题。

从《八连》看种族，也确有专业艺术史家的研究支撑。在梳理西

① Op. Cit. Rubén Carrillo Martín, p. 28.

② Ibid., p. 232.

③ [美]亨德里克·塞里、[美]许烺光：《世界各国的华人群研究导论》，陈睿腾、游国龙译，《华侨华人文献学刊》2021年第2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④ 墨西哥文学在独立运动时期的《癞皮鹦鹉》（1816）中才开始出现亚洲形象，参Koichi Hagimoto, “A Transpacific Voyage: The Representation of Asia in José Joaquín Fernández de Lizardi’s *El Periquill Samiento*”, *Hispania*, Vol. 95, No. 3, 2012, pp. 389–399.

属墨西哥种族画传统和研究史时，伊罗娜·卡泽夫就用这幅画中主入口上的标号，来提示油画背面留下的说明：数字对应着“住在墨西哥城的各色人等”，但无论是那21个种族血统名称<sup>①</sup>还是从画中形象看，都没有表现华人（chino）。实际上，自从19世纪末法国人类学家开始注意到种族画<sup>②</sup>，到1989年加西亚·萨伊兹专著较为详尽地研究了59幅/套作品<sup>③</sup>，再到2004年卡泽夫本人的专著明确1710年到独立战争百年间，新西班牙画家共留下百余幅这类作品<sup>④</sup>，从未有对华人的讨论，爱德华·斯拉克甚至断言“没有一幅画表现了亚洲人”<sup>⑤</sup>，即成人和婴童相貌、服饰、日用品图像上没有体现出任何亚洲特征，亦即画者没有视觉经验，也不认为存在相关性和影响。

图解文字里出现“chino”一词时，所指也十分复杂多变，更加体现出该词没有进入时代人群的认识秩序中。18世纪中晚期，殖民地精英认为有黑人血统者为chino/china，如1763年，巴萨拉斯对菲律宾进行了两卷的文字介绍，106幅图中就有此类人，但指的是总督辖区本土居民，是黑白混血的穆拉托人（mulatos）再跟印第安人所生的后代。<sup>⑥</sup>这一观点被游历的洪堡记录下来，说“墨西哥城、利马，甚至哈瓦那的黑人跟印第安妇女所生的孩子，被奇怪地叫作chino”<sup>⑦</sup>。这也是大部分种族画中对此词的图像表达，如下图：

① Ilona Katzew, *Casta Painting, Images of Race in Eighteenth-Century Mexico* (New Haven and London: UP Yale, 2004), p. 207.

② Ernest Theodor Hamy, “Peintures ethnographiques d’Ignacio de Castro”, *Decades americanae: Mémoires d’archéologie et d’ethnographie américaines*, I-II, no. 14, 1884, n.p.

③ María Concepción García Sáiz, *Las castas mexicanas: Un género pictórico americano* (Milan: Olivetti, 1989).

④ Op. Cit. Ilona Katzew, p. 3.

⑤ Eduard Slack, “The Chinos in New Spain: A Corrective Lens for a Distorted Imag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0, No. 1, 2009, p. 57.

⑥ Ibid., pp. 57-58.

⑦ Alexander de Humboldt, *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 trans. John Black, 4 vols.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Paternoster-Row, 1811), I: pp. 244-245.



Chino男与印第安女生出赫尼萨罗人 ( De Chino e India, Genízaro )  
弗朗西斯科·克拉佩拉画, 54cm × 40.5cm, 约1785年, 布面油画  
现藏于美国丹佛艺术博物馆<sup>①</sup>

另一方面, 通过菲律宾来源的书籍和档案, 新西班牙会将 chino 用作统称, 泛指所有的亚洲移民<sup>②</sup>, 如最近十余年专注此研究的奥罗佩萨就整理了1565—1673年间新西班牙亚洲奴隶的来源地, 主要分葡属东印度、菲律宾和其他地区(日本、爪哇、巴布亚、中国), 随后做注说明“想要查清真正的中国人非常困难, 因为 chino 一词用于以上所有地

<sup>①</sup> 电子版图片来源: <http://artecolonialamericano.az.uniandes.edu.co:8080/artworks/13259>.

<sup>②</sup> Déborah Oropeza Keresey, “La Esclavitud Asiática en el Virreinato de la Nueva España, 1565–1673”, *Historia Mexicana*, vol. LXI, núm. 1, 2011, p. 17.

区，几乎等同于整个南亚、东南亚、东亚一线的亚洲。<sup>①</sup>此外，chino 有时候还作为形容词，修饰指“东印度人”的indio，同样泛指“亚洲”，正因为这样，奥罗佩萨2020年出版专著时，把2007年博士论文标题中的“indios chinos”替换成了现代概念“亚洲移民”（migración asiática）。

无论艺术史研究种族画止步于欧洲白人、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形象，还是历史学解读档案文献小心区分chino的所指，都可以用成语“名正言顺”或者“词与物”的理论来揭示，新西班牙文化环境中游移的chino，证明殖民时期没有专指“华人”的固定、通用的语词，也即这一现象虽已存在，但并没有成为一个社会性明确认知的对象。墨西哥自征服、殖民时期产生的种族主义，追随西班牙话语，将白皮肤、半岛出生视为正统，将之建制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必然和特权，蔑视、无视其他群体的权力和表达。<sup>②</sup>而且遗憾的是，这一情况在当代学术体系中并未引起重视，根据2016年一份研究综述，1956—2014年间仅有26份学术期刊发表过66篇有关墨西哥种族主义的文章<sup>③</sup>，并只有2001年的蒙特马约尔提及“墨西哥现代科学的种族主义出现并进入了舒适区，只要沿着一条路走下去就可以有丰富的成果：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白人几大主体的种族化，以及他们对他者的感知，如黑人、犹太人、华人、黎巴嫩人、吉普赛人”<sup>④</sup>。可见，尽管墨西哥在大革命之后的1921年推动“混血种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历史文化的合法继承人，但其依然是本体论的，是封闭的，依然在造成新的种族主义。

① Déborah Oropeza Keresey, “La Esclavitud Asiática en el Virreinato de la Nueva España, 1565–1673”, *Historia Mexicana*, vol. LXI, núm. 1, 2011, p. 28.

② Joaquín Careaga Medina, “Racismo y poder en la sociedad mexicana. Origen, evolución y consecuencias”, *XXVII Congreso de la Asoci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Sociología. VIII Jornadas de Sociología de la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Asoci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Sociología*, Buenos Aires, 2009.

③ Mónica G. Moreno Figueroa, “El archivo del estudio del racismo en México”, *Desacatos*, 51, 2016, p. 93.

④ Carlos Montemayor, “La racionalidad e irracionalidad de los indios”, *Ciencias*, núm. 60, pp. 20–21.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便理解，殖民时期华人之不可画与不可见表面跟移民数量大小、自身是否彰显有关，深层是遭遇了当时更加狭隘的思想体制的钳制，华人不在预期和推崇的范围，因而无法被看见，正如墨西哥学院著名汉学家波顿所说，墨西哥得天独厚地处于两洋之间，却没有向两边平等地投注目光，在坚持叫作东方的西边，对中国总持从欧洲进口的成见，欠缺反省，态度亟待检视。<sup>①</sup>

## 结 语

近年来，“大帆船”贸易研究日渐兴盛，但在“全球化”的宏观理论上，还较少建立社会空间中的“网络”，也没能深入考察“互动”。本文通过17世纪末、18世纪中后期的两幅油画，视觉呈现该海上贸易进入墨西哥城的终端“八连”市场，并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和文化追溯，还原了其修建的背景、规划、命名，再根据一份略早的财产清单，对该市场中的货品进行了指认。

可以说，从设想到开业，这个市场历经十余年时间，成为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上第一个永久性建筑，以间接的形式清理了早先流动摊贩的脏乱差，温和渐进地创造了一个城市核心地带的固定商圈，是18世纪墨西哥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商业空间。应当承认，这个市场的营建过程跟“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其批准者为西班牙国王，募资者为新西班牙总督，包括设计、捐资、管理全部来自殖民地的城市规划和商业、行政人员，这一点上，中国确实没有必要做任何的攀附，但值得追问的是，一切本地努力都用菲律宾的华人市场之名进行凝练，无可否认地证明了“八连”所代表的帝国遐想：跨太平洋两端极大的物质丰富和心理刺激。

同时，本文也无意过分鼓吹中墨早期关联，事实上，物的流动性、

<sup>①</sup> Flora Botton Beja, “La persecución de los chinos en México”, *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 vol. XLIII, núm. 2, 2008, p. 477.

操作性还是相对简单，与之相随的人却没有那么容易进入他者的话语体系，导致画中毫无中国人物的设置。16世纪末便开始漂洋过海前往墨西哥的华人，不知道凭借怎样的语言，有些什么被迫或主动的“美洲梦”，但他们在大广场上挑担剃须、吆喝兜售，他们更名改姓逐步进入更高级的商业体系，他们也是墨西哥“青铜种族”的历史血脉，不应当被忽视、被擦去。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的重要国家，在地缘政治、经济体量、文化资源等各方面均具有战略意义。2022年是中墨建交五十周年，把两国交往的历史向前追溯，确定两国交往的历史起点，是学界应有的兴趣和应尽的责任。中国曾经在墨西哥城的中心吗？是的，一个宏大的存在。中国曾经在墨西哥人心中吗？未必，但没关系，那是因为遥远的距离。现在的我们有时间，未来我们还将努力。